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ROBERT BURTON

忧郁的解剖

(增译本)

[英] 罗伯特·伯顿 | 著

冯环 | 译注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ROBERT BURTON

忧郁的解剖

(增译本)

[英] 罗伯特·伯顿 | 著

冯 环 | 译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忧郁的解剖：增译本/[英]罗伯特·伯顿
(Robert Burton)著；冯环译。—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55-1688-2

I. ①忧… II. ①伯… ②冯… III. ①抑郁症—研究
IV. ①R74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1215号

忧郁的解剖(增译本)

作 者 [英]罗伯特·伯顿
译 注 冯 环
责任编辑 杨 超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8年11月第2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688-2
定 价 5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1932年版 导言

○霍尔布鲁克·杰克逊*

一部论述忧郁症的专著，竟成了英文作品里的一大消遣读物，这真是出人意料。然而此一反讽却得自于机缘巧合。因为即便写《忧郁的解剖》的人不完全属于马可·塔普雷^①一脉，他也称不上是忧郁症患者，亦未有过编写一部感伤之作的念头。罗伯特·伯顿可谓乐观的悲观者，若非他亲口道来，我们怎也不会猜到 he 竟忧郁成性。忧郁，之于他是不幸，之于我们却是万幸——须知此乃促成他写下这部闲书的首要原因。而倘要一证伯顿那骨子里的好性情，我们就得援引肯内特主教^②所讲的故事了。据其言，伯顿在不堪忧郁之重负的时候，便会离开他在牛津基督堂的书房，漫步至佛里桥，去听船夫们卖劲儿地打嘴仗，好借此来给自己找点乐子。不过，伯顿又坦言他写《忧郁的解剖》是为了排遣自身的忧郁。我们虽无法确知这法子是否灵验，但可以肯定的是，三百多年来他的作品已然成了忧郁的“预防剂”。他那虽怒气冲冲却又悲悯仁慈的灵魂依旧在其大作的后续版本中行进着，为无缘受惠于其生前风采的后代开辟了一条条快乐的新路径。

有关伯顿生平的细节是极少的，然而，过多的细节也无甚必要。不是

* 霍尔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 Jackson, 1874—1948)，英国记者、作家、出版家。他的《藏书癖的解剖》风格上完全仿照《忧郁的解剖》，也是极有趣的一部奇书。

① 马可·塔普雷(Mark Tapley)，狄更斯小说《马丁·翟述伟》中的人物，一个十足的乐天派。

② 肯内特主教(Bishop Kennett, 1660—1728)，全名怀特·肯内特，英国主教、珍本古书藏家。

有“书如其人，人如其书”的说法吗？罗伯特·伯顿就是这样的作者，《忧郁的解剖》也正是这样的书^①。伯顿仅有的生平资料如下：1577年2月8日，生于莱斯特郡林德利府，在全家九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先是就读于萨顿科尔德菲尔德的私立学校，而后转入纳尼顿文法学校；1593年进铜鼻学院，1599年又进基督堂学院，1614年获神学士，两年后任牛津圣托玛斯教堂牧师；1630年受恩主伯克利爵士乔治之助，得亨莱斯特郡西格雷夫教区圣职。他擅作拉丁文和英文诗，参写过数部学术选集，并在31岁那年，还创作了名为《冒牌哲学家》的拉丁韵文讽刺喜剧。这是他流传下来的第一部作品，于1615年经他改写一遍，并于1617年在基督堂由学生搬上舞台。《忧郁的解剖》（以下简称《解剖》）则出版于1621年，在作者生前共刊行过五版。伯顿亲见印行的最后一版是1638年那版，也就是在这之后的一年，他去世了，享年63岁，被葬在了大学的主教堂里。其兄威廉，即《莱斯特郡纪》（1622年）的作者，在此为他立了座半身纪念像，并涂以颜色使之栩栩如生，这遵循的是当时的旧俗。

伯顿一生无甚波澜。“在大学里，”他说，“我过着一种安谧沉寂、一成不变、退隐遁世的生活，独自一人仅有诸位缪斯做伴，其时日之长久恐与雅典的色诺克拉底相差无几，竟至垂垂老矣。如他那样为了求知求识，我亦是夜以继日地枯坐在我的书斋里面。”这话我们信，因为职务可托人代理，也可撇下不管，无论怎样他都匀得出时间来——尽管他身为牧师，而且有几年还供职数地，担任了不少职务。然而，若因此就断定创作《解剖》这类庞杂的大作必然会成了其全部的事业，则又属推演过当。须知勤奋加上以苦为乐是足以让人在忙碌的生活之余暇中创造出奇迹的。伯顿说来虽已离群索居了，但也绝不是什么隐士。除了担任教堂神职外，他还做了些别的工作，比如自己学院的图书馆长、牛津市场的检察官（至少供职了一年）。不过通体来看，伯顿本质上还是学者、书痴。他总是惬意地幽居在自家堆满书籍的屋里，或待在所谓“欧洲最辉煌的学院”那宏伟的图书馆（即博德利图书馆）

^① 大意是读《解剖》就等于读伯顿其人，除此之外也无多少其他资料，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更详细的论述。

中，研究忧郁的成因与疗法，力求不当“寄生虫”或“如此高贵的学术团体中无用又不相称的一员”，亦不写“任何有损于这般恢弘的皇家学院之荣誉的文字”。

通常而言，像伯顿这样的人往往会流于学究气。然实际上，伯顿写书的风格虽属学究式，其观点却远非如此，他的身上也鲜有学者的坏毛病。此外，他的牧师身份亦未见诸其文风，因为《解剖》一书实在不大像是牧师所写的：他连训诫也显得彬彬有礼，说话也说得活活泼泼，饶有趣味，尽管按托马斯·赫恩^①的说法有那么几分“不谙世故”——不过，诸如此类的细节，我们却知之甚少。因为说来也怪，尽管伯顿当初在学院里无人不晓，其作品也颇受欢迎，可他竟落得跟莎士比亚一个下场——在当年的街谈巷议中几乎没有听人提到过。除了关于他任职情况的文档资料和零星散见于其书中的生平片段外，在与他同代的文献中还未曾出现任何涉及他的有用信息。而要待伯顿长眠五十余年后，才会有安东尼·阿·乌德^②在《牛津名人传》中为其写下一篇性格特写。然而，乌德本身并没有见过伯顿，他只是同见过伯顿的人谈过话而已，所以这位牛津史家的文字也仅为老调重弹。其实，乌德所写的那些，我们只消看看伯顿自己书里相关的只言片语，就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

安东尼·阿·乌德写道：“他是个严谨的数学家、精准的算命师、博览群书的学者、研究古典的专家，且还对地理勘测颇为精通。有不少人将他称作了严肃的学人、嗜书的饕餮，性情上忧郁而不失幽默；另有一些相熟的人还说他为人老实、坦诚又敦厚。我自己亦常常听一些基督堂的前辈说，有他在就会有乐子——他诙谐幽默，童心未泯。虽按当时学院里流行的做法，他也爱在寻常对话中夹带诗人的诗句或古典作家的话语，不过他于此的敏捷和机巧却是无人能及的，这也就使得他越发地受人喜爱了。”

至于伯顿的样貌，我们则能据其肖像推知。他的肖像共有三种，即藏于铜鼻学院里的油画，《解剖》一书卷首由拉·伯隆^③刻制的雕版小画像，以

① 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e, 1678—1735)，英国古籍藏家。

② 安东尼·阿·乌德(Anthony à Wood, 1632—1695)，英国作家，以编撰《牛津名人传》闻名。

③ 拉·伯隆(Le Blon, 1667—1741)，德国雕版画家。

及牛津主教堂中的彩绘半身像。借此我们便可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来——我们这位英国的德谟克利特正置身于书本堆中，其所在之地恰是彼时那座著名的、业已显赫的学院。他身形壮实，且略有点发胖，深棕色的胡子修得很是规整，大大的眼睛里还闪着一缕讥讽的光，而硕大的额头则显出了睿智和好记性。他的鼻子神采奕奕，那嘴就如同所有见识不凡的人一样，也是又利又尖（但还好下嘴唇是较为宽厚的）。这看起来是一张才华横溢、若有所思、怡然自得的脸，略微地带着点儿羞涩，仿佛是在暗示此人爱幽居胜过了冒险——当然，于群书中探胜又该另论。其实，这种面相在当时的英格兰可谓比比皆是，即便到了现在也仍未绝迹。而靠了上述拼合而成的形象，我们还可进一步做出如此的推断——伯顿其人虽亲切却孤僻，虽谦虚却固执，为人友善但不至热心过头，宽厚而又易怒，不笑人傻，只怜悯傻人。

至此，关于伯顿我们已谈了这么多，也细细地听了安东尼·阿·乌德的说法，但我们还远未触及伯顿的灵魂，亦未摸到伯顿之为伯顿的本质。这位解剖大师真是矛盾体。他同其他怪人一样，也断不会始终如一。他宣讲中庸之道却不践行。他写书总是连篇累牍，笔下的每句话都词富义繁。他这书虽说是世上引语用得最多的，但读来却又如小说一般轻快。他往书里面塞的文字，也是至理名言与胡言乱语相杂糅。在书中，他总不忘抱歉自己啰里吧嗦，可刚道完歉转身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他生怕会把爱之忧郁讲过头，但之后他还真讲过了头。他没有结婚，然婚姻之于他也不是什么秘密。他嘲笑世人，但同时也悲叹世人的不幸和愚蠢。他既信科学，也崇迷信。他有时粗言糙语就像个写淫书的，有时又扭扭捏捏，活脱脱一个假正经。他把插科打诨与神学宗教相提并论了起来。他虽不故作幽默，但却远要比专业的小丑还好笑。他最郑重的时候显得最轻浮，而他随口说说的时候又最为意味深长。与惠特曼一样，他也是浩瀚无垠、包罗万象的。他把自己连同整个古代的学问都倾注进了他的书里，然后又巧妙地将这团大杂烩变成了一部条理分明的专著。这本大部头的书，读起来可能会把读者累到，但写起来他却不厌其烦。

罗伯特·伯顿实乃一个彻头彻尾的书痴，他成天活在书堆里，嗜书如命，并且还用大半辈子写了本将古往今来的所有书籍都熔于一炉的精粹之作。这



上图 《忧郁的解剖》一书卷首由拉·伯隆刻制的雕版小画像

左下 藏于铜鼻学院里的油画

右下 牛津主教堂中的彩绘半身像

部论著出自嗜书者的手笔也属情理之中，它即便只是各类著作的集萃，然仍不失为一部原创作品。——诚然，《解剖》看上去颇似一册东鳞西爪的引语集，也的确大幅地征引了他人之观点和看法，但浮现于每页书上的并非被征引的人而是伯顿那个“劫掠者”，躲在每句引语后面不时窥探两眼的也唯有伯顿罢了。这个中的缘由显而易见，即伯顿堪称精通文字马赛克的艺术家的，善于把从他人著作中扯下的碎屑纸片拼接成一幅个性鲜明的画作。所以书本也就成了他的原材料。其他的艺术家拿泥来塑像，取石头来做花样和造型，将文字、声韵或颜色调配和谐，而伯顿则是在用引语塑造“宇宙”。他劫掠古时的著作（大多早已湮没或毁损），并将搜刮到的东西都囊括到了自己的构架内，这就好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取法古罗马遗迹，将个中所获运用到了文明新纪元的教堂和宫殿里。

对于该书的奇谲构架，伯顿会经常地为之而辩解不休，这让人感到颇有点多此一举。不过，他的辩解却既非源自假谦虚，亦非出于他的自卑。伯顿可是从来都不缺那份自负的。他深信自己能写完这部大作，也从不怀疑自己的睿智。通常而言，肯去创作近五十万言大部头的作者，哪会不坚信其书是值得写的呢？所以，伯顿的辩解也只是遵从旧俗罢了——17世纪作品的正文前都得要有一篇作者的辩白。伯顿曾为他的主题辩解，为他呈现主题的方式辩解，甚至还为书名辩解。从这些辩解来看，伯顿的去写忧郁，实非仅仅如其在某处所坚称的，是为了让自己摆脱忧郁。他还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即忧郁诚为“一门必要、合宜的科目，且还不似神学那般司空见惯，争议纷纷——虽然我也承认神学是众学科之女王”。而该书的书名，如今看来则是再明晰不过的了，他实在没有必要去援引先例，因为那时候解剖类的书和现今的各种文选一样也是随处可见的。至于书名的略微古怪，伯顿却放任之，因为“如今给待售的书籍加上个新异的书名已成了一种策略，正如云雀飞落捕鸟网，不少喜欢猎奇的读者也会受书名吸引而留步——好似痴愚的过客驻足凝视着画店里某幅哗众取宠之作，而那真正高明的画，他是连瞧也不会去瞧一眼的。”此外，伯顿也用相似的理由来辩解他为何主要用英文来写此书，他说“我本无意用英文写书来把自己的思想糟践”，但若用拉丁文来写呢，则在当时又没人肯承印。“我们唯利是图的出版商只对英文的论战小册子来

者不拒，统统付梓，但凡是拉丁文的，他们便不肯接手。”我们还是不要跟着伯顿一道去痛斥那些贪财的出版商了，若是他们不以自身利益为计的话，我们哪能得见伯顿的英文大作，恐怕伯顿早就如许多饱学之士那样淹没于无闻了吧。

伯顿文风之独特多得自于其写法上引经据典之铺张。他实可谓此类技法的大师，他那引语的庞杂、奇崛和机巧总能令读者的心为之一振，眼为之一亮。所以在那个不乏精于此道者的时代里，伯顿才能够轻易地脱颖而出，达到在警句箴言之编排上无人能及的地步。而如果把这些独特、有趣的赘词冗言都统统剔除掉的话，或许伯顿的散文就要反倒流于直白和寡淡了。伯顿的文字，正是多亏了有一种轻快、如断奏般的风格，才能使得他那漫漫长卷总是流畅可读。我又常听人言伯顿为文古怪，然他距我们年代已远，觉其古怪也在所难免，故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伯顿虽则自觉地征引并创制了一组组的绝妙好辞，但他却并不仅仅着眼于文辞的创造。伯顿从不循文辞至上的做法，不似布朗和多恩那样会让人觉得他们在写就一句之后还要往后退几步欣赏一番。伯顿的文风太过口语化了，不适合那样去雕琢，其文读来真仿佛是闲谈一般。你能听得到他声音的抑扬顿挫，那声音好辩而又亲切，总在不厌其烦地给建议，作说明。——然即便是这样，他也总能以一个巧妙的转折或突如其来的翻转令你不至落入到单调乏味中，而就算这法子失了效，他还能拿出窖藏的奇闻异事，引人入胜地向你一一道来。

《解剖》一书部头大，范围广，可谓搜罗古今，穷极八荒，潜于过往，浸入未来，并以嘲讽之态扫视当下。尽管伯顿所选的主题乃忧郁，但他却靠了插话和题外话，近乎谈遍了人类的每一种趣味或活动。因此，这部著作实可算作对人类之生活与习好的一篇评述。而且，它还是横跨在中古思想与当代思想之间的桥梁——一方面唱响了专制的经院哲学的挽歌（全是格兰维尔^①在其《教条之虚妄》里所谴责的），另一方面又预示了观测实验法的到来。在书的结构上，伯顿取的是当时传统的纲要构架。《解剖》一书共分三大“部”，往下又细分出许多的“章”“节”和“小节”，而书中大、小标题则

① 格兰维尔（Glanvill，1636—1680），英国作家、哲学家、牧师。

以纲要形式分置于各部卷首。全书内容，除三大部和相应的章节外，还收录了伯顿自认的种种“离题话”——篇幅大多堪比论文，以及那“便于引入正题的讽刺性前言”——在对开本的定版中足足填满了78页纸。

威廉·奥斯勒爵士^①曾将《解剖》誉为“外行人写得最好的医学专著”。不过，书之主题虽属医学一类，但书里也有貌合神离，实可单独成篇的章节——其中有些甚至还具有开创性。例如，题为“闲话空气”的一章，娓娓不休，趣味盎然，乃第一篇谈论气候学的专文；而“宗教忧郁症”一节，则可说是对该题的首次探讨。伯顿对性心理学的研究实要早于霍理士^②，他对罗曼蒂克爱情的拒斥又要先于萧伯纳^③。他的论“妒忌”数章涵盖了所有战后问题小说的要素，而藏在那篇有名的前言中的“乌托邦”则还能让人想到威尔斯^④。在书中，伯顿向我们展现出了多种面孔，他既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个英格兰本土主义者、贸易保护主义者。此外，他还是垄断的抵制者、战争的抗议者，而对于改善公路、拓展内陆航道、开垦沼泽地、兴建花园式村庄和发放养老金，他则予以了赞同。

《解剖》仿佛就是那种具有人性和人格的书，这类书似乎是生长发育而成的。像《解剖》这样能与作者如此显明而又如此精微地融为一体的书，真是世间少有。《解剖》就是伯顿，伯顿也就是《解剖》。读《解剖》即在读伯顿，所谓读伯顿便是与之相谈，他读来就像是小说中的主角一般。换句话说，伯顿是那类少有的作者，他们能将自己完全投射到作品中去，从而跟小说和剧作巨匠创造其故事和戏剧中人物一样，以相类的才能塑造出了自己的鲜明形象。伯顿与蒙田、皮普斯^⑤、兰姆^⑥相仿，已将自己小说化了，变得与真人相

① 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 1849—1919），加拿大医师、医学教育家，改革临床教学方法，著有《医学原理和实践》等。

② 霍理士（Havelock Ellis, 1859—1939），英国散文家、编辑和医生，著有《性心理研究》。

③ 萧伯纳（Bernard Shaw, 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戏剧上主张摒弃罗曼蒂克。

④ 威尔斯（H. G. Wells, 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邦盖》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⑤ 皮普斯（Pepys, 1633—1703），英国海军高官，以其日记闻名。

⑥ 兰姆（Lamb, 1775—1834），英国散文家、评论家，以伊利亚为笔名发表的随笔触及社会矛盾，与胞姐玛丽合编《莎士比亚故事集》，著有《伊利亚随笔集》等。

异，但却又更加有趣。

《解剖》一书于1621年面世，那一年伯顿正好45岁。当时的版本采用的是小四开本，全书近900页，已然部头过大。不过在接下来的17年中，它的内容还将继续增加和受到修订。——于此期间，《解剖》共计再推出了四版，分别印行于1624年、1628年、1632年和1638年，各版均用的是小对开本。然而，待到作者去世后，也就是在1639至1640年间，《解剖》一书的出版便始现颓势了。比如1651年版，其印刷和纸张就皆堪称低劣——此版乃《解剖》在作者身后的第一次重印，收录了作者生前所作的修订，往后当再无修订一说。而在1660年，《解剖》又有新版面世，但那质量却是更加地不堪。经过诸多版本后，该书在17世纪的最后一版，竟成了1676年那册细长的对开本，原书的精彩和风貌早已荡然无存。此后的124年间，《解剖》就再没有新版本问世了。若仅就出版于17世纪的书而言，实在还未曾见到有哪一本能比此书更清楚地展现作者对印刷商所施加的个人影响。在《解剖》1638年前的所有版本中，是均能见到伯顿经手其事的痕迹的，那种种的改动真是数不胜数——大多是些小的，甚或心血来潮的改动，然偶尔亦有大刀阔斧的删改。由此，便也彰显了个人之口味与偏好，实有别于当时牛津这等印刷局正在刊行之物的风格。此外，《解剖》的作者虽说是个道地的读书人，但也免不了与他的出版商亨利·克里普斯和伦纳德·利奇菲尔德（“那座著名大学的印刷商”）展开一次次激烈的交锋。然据我猜想，伯顿应该总是胜利而归的，因为他还设法在这呕心沥血之作的版式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其实，能否欣赏得来伯顿，很可考验一个人的嗜书程度。虽然伯顿从来就不缺读者，即便在1677至1799年间无一版《解剖》面市的“黑暗时代”都有人读他，但贬低和歪曲他的，也从来不乏其人。此刻就算有必要，我也不想为他做什么辩驳，况且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读不读伯顿全是自愿的，不必强求——伯顿是专属于“伯顿徒”的。不过，我还是有必要提一下那些古往今来歪曲过他的人，因为他们的歪曲多数是信口雌黄。所谓的批评家和评论家往往不肯花工夫去读此书，当然也就更别提理解此书了。由此，

才涌现出了那些流传甚广的胡说八道。比如，哈勒姆^①的称《解剖》作“对博德利图书馆各种文献的一次清扫”，或洛威尔^②之言

精心的杂乱如烂泥深及踝部，
里面全是东拼西凑的老典故。

就皆是典型的例子。

无知的学问人对伯顿的明褒实贬总要多过直白的嘲讽。那种快人快语的贬抑者，我本人也仅知一个，即马恩岛诗人托马斯·爱德华·布朗^③。1895年，在一篇写给《新评论》的言辞激烈又毫无幽默感可言的文章中，这位业余作诗的教书匠竟为我们的好伯顿写不出一句好话来。据他所言，伯顿的学问只是种“炫耀”，实乃“在过度虚荣心的支撑和驱使下博杂地吞书噬卷后的产物”。而伯顿对其书的编排也无外乎“表面上的分类”，仅是“虚假的条理和次序”。不过，布朗亦承认伯顿有“骂人的才能……乱哄哄闹得出奇的一片痛骂”。此评断显出了布朗对伯顿怀有的一种隐约的敬重——尽管带着点自命不凡的味道。与查尔斯·兰姆一样，布朗也是反对重印《解剖》的。兰姆曾言：“我真找不出有比重印《忧郁的解剖》更惨不忍睹的景象了，有必要把那位老怪杰的尸骨挖出来，裹上时新的寿衣，任由现代人评头论足吗？又有哪个没眼力的书商竟会痴想伯顿破天荒地走红呢？”^④ 布朗当然不会这般地宽厚，或这般地富于浪漫气息。他虽承认老伯顿固有其魅力，但却又说那也仅存于“老图书馆中。积年的灰尘将之封藏，且又为古旧的回忆所萦绕，只

① 哈勒姆(Hallam, 1777—1859)，英国历史学家，著有《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文学引论》等。

② 洛威尔(Lowell, 1819—1891)，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外交家，主要诗作有《比格罗诗篇》、长诗《大教堂》等，著有评论但丁、莎士比亚等的论文，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驻英大使。

③ 托马斯·爱德华·布朗(T. E. Brown, 1830—1897)，马恩岛诗人，学者、神学家。

④ 兰姆把伯顿视作古代的珍宝、陈年的佳酿，认为伯顿的书只能以页边堆满原注的笨重的对开本来呈现，那些现代的新版设计和装帧是对其书的亵渎。不过，说来也讽刺，正是因了兰姆及其友人，伯顿的书才又获热销，以时新的样貌重现于19世纪的书肆中。

可在此寻个究竟”——他认为就只该在这种地方展读其书。“湮没、朽败，”布朗提醒道，“乃此类冗长乏味之怪书的宿命。而去把它们打扮一番，使之变得整洁利落，光鲜亮丽，并纳入到文学之林中，这样的做法，就真不知是何居心了。它们是只应藏于地窖中的，学者才是其天生的朋友和看护人。就把这些书交给学者去研读吧。”布朗的说法谬则谬矣，但至少看得出来他是读过其手里的伯顿的。

而伯顿的褒扬者，则从他生前到现在都未有缺断。他得到过安东尼·阿·乌德的嘉奖，连素来毒辣的托马斯·赫恩亦对他有过赞誉，并且后者还无意间透露出18世纪上半叶《解剖》的不再走俏。“历来没有什么书能比伯顿的《忧郁的解剖》更为畅销，”赫恩在其日记（1734年）中写道，“由于书里包罗着各种学问，所以也成了剽窃者的摘引簿。该书之印量极大，那书商还由此而立了业。不过现今它却受尽冷落，一册善本（虽是第七印）只消一先令就能购得，且还装帧精良……”20年后，又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赫林^①劝朋友“读一读”《解剖》，因为伯顿属于“最有趣、最有学问、也最有绝佳见识的人……安妮女王的治国之道、乔治一世的开创新朝，受惠于伯顿处均不可说少”。

伯顿堪称剽窃者的粮仓、借鉴者的矿山，这种说法是世所公认的。《解剖》就好比一只百宝袋，从中取宝的人既可以是抄袭者、正当的掠取者，也可以是约翰逊博士这样的猎奇的读者——此书“能令他早起两个小时”。许多才子作家都靠劫掠伯顿为我们的文学宝库添了彩。约翰·费瑞尔^②在其《解读斯特恩》中，即指责劳伦斯·斯特恩^③的《项迪传》混入了太多《解剖》的内容——“一度是学问人和才子的最爱、许多人的枕中秘宝”。沃顿^④亦发现弥尔顿在创作《沉思者》时不免向伯顿取经，他于是借此为《解剖》写了一段妙评：“作者那博杂的学问，从稀世奇书中搜罗来的妙语，闪着粗朴之

① 托马斯·赫林（Thomas Herring, 1693—1757），1747至1757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② 约翰·费瑞尔（John Ferriar, 1761—1815），苏格兰医生、诗人。

③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项狄传》《感伤旅行》，前者全书无情节，写法奇特怪诞，被认为是小说的意识流手法之先驱。

④ 托马斯·沃顿（Thomas Wharton, 1728—1790），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诗人，曾荣获“桂冠诗人”（1785—1790）。



詹姆斯·巴塞尔^①制作的线雕版画

^① 詹姆斯·巴塞尔(1730—1802),英国著名雕版画师,大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在他的门下做了七年学徒。